

## 中共崛起的理論與實際： 國際關係理論的檢視與分析

鞠德風

大同技術學院通識教育  
中心助理教授

董慧明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政研所博士候選人

### 摘 要

當前「中共崛起」已是個不爭的事實，各界對於這個政治現象也多所探討與評估，惟在國際關係理論之運用與主張則是論辯之核心所在。為了穿透「中共崛起」之表象，本文採取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與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為途徑，先探討各理論之意涵，進而以理論特性檢視中共崛起的實際事例，並發現中共正以發展「柔性國力」（soft power）影響國際體系，而三大主流理論在面對中共崛起時，本文主張研究者必須熟稔相關理論之特點與侷限，進而採取多元的（plural）態度深入研究，以能夠包容、客觀與周延地對於「中共崛起」這一政治現象加以描述、解釋甚或預測，或是探究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能否用以觀察此現象。

**關鍵詞：**中共崛起、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建構主義

# **A Study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hina Rising: Reviewing and Analyzing fro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eh-Feng Chu

Assistant Professor  
Tatung Institute of  
Commerce and Technology

Hui-Ming Tung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 **ABSTRACT**

"China rising" is an indisputable fact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focuses on this political phenomenon.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s still debatable. In this article, we used neo-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and try to approach this critical issue, not only to explore the meaning of theory, but also to review the actual cases, and find out that China is developing "soft power" to influenc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In order to correctly describe, explain and predict the effect of China rising, this article advocates that the researchers must be familiar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underst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heory. Finally, we should take a plural vision to study, and achieve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ity goal.

**Keywords : China Rising; neo-realism; neo-liberalism; constructivism**

## 壹、前言

「崛起」(rise)是種相對的概念，正如同政治學者 Ted Gurr 在《為何人們會起而造反》(Why Men Rebel)一書中曾對所謂的「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所下的定義：「一個人主觀認知上，價值預期與價值能力之間的不一致」(Gurr, 1970:13)。吾人若將個人的政治行為比喻為國際政治中的國家行為，當前中共的崛起(China Rising)所帶給鄰近、區域和國際體系間的相對剝奪感或威脅感也就不難想像，而這也是「中共崛起」與「中國威脅論」為何經常為人相提並論之原因所在。換言之，中共崛起是相對於其鄰近地區或其它強權的沒落，或是相對於鄰近地區或其它強權的成長，不及於中國的成長，而顯示出的相對威脅，這是具有主觀與客觀的威脅認知。

目前在國內、外，無論是學術界或是政府智庫、實務單位對於「中共崛起」之議題已被廣泛討論，其中有以中共的經濟能力為要，抑或針對其軍事力量、綜合國力與區域安全等作為研究之議題，惟無論研究的重點置於哪個領域，最常見到的研究途徑莫過於國際關係理論。然若以方法論(methodology)的角度予以審視，實難以發現在現有國際關係理論中，有任何一個理論能夠完整地解釋「中共崛起」現象，而有關理論之間的論戰，亦為此議題探討之最大爭議點所在，而有深入研究價值。

本文基於上述構想，欲以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與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等三大國際關係理論，觀察與詮釋「中共崛起」這個備受關注的議題，<sup>1</sup>並且嘗試回答下列問題：

一、中共所稱「和平崛起」的實質意涵為何？在其發展的過程中，現存國際體系結構所受到的影響與改變又為何？

二、當中共無法再抱持「韜光養晦」策略，以發展中國家自居時，她應該以什麼樣的國家行為去扮演好在對國際社會中做個「負責任的大國」的角色？

三、在中共躋身國際體系時，其國家身分的認同，如何影響她在國際中的國家行為？

藉由上述問題之探討，冀能深入剖析中共崛起的實際影響並且檢視國際關係理論運用之適用性與侷限性。

---

<sup>1</sup> 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為國際關係三大主流理論已是國際關係學界共識，惟各個理論下仍有不同的分支觀點，本文受限於篇幅而無法逐一探討，僅挑選最具有代表性學者之觀點進行研究。

## 貳、「中共崛起」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途徑

國際政治學學者 Kenneth Thompson 在《站在思想巨人的肩膀上》（*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The Legacy of Political Theory*）一書中曾就政治哲學與國際政治之間的關聯性進行探討，並且認為：「哲學研究途徑的運用與掌握，能使現實中不斷變化的國際關係理論免於陷入誤解，從而為國際關係理論提供一種研究權力與道德、和平與秩序等議題檢驗的基礎」（Thompson, 1994:8）。而基於這樣的觀點，顯示出「理論」在任何國際政治現象之研究過程中，實具有核心價值。

另一方面，關於「中共崛起」這個議題，學術界的研究學者基於各自擅長的理論、方法，經常可見從政治、經濟、社會等各種面向就崛起現象（phenomenon）進行探討。本研究雖然也以「中共崛起」為研究對象，惟重點置於國際關係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層面，亦即在探討國際關係理論中有哪些論點能夠合理解釋「中共崛起」。因此，研究之主軸並非在討論造成中共崛起的因素等因果關係問題，而是先從方法論（methodology）的角度出發，一一檢視在國際關係理論中較具主流代表性的「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與「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等三大理論體系中，各個理論之內涵，藉以釐清理論之間的差異，穿透中共崛起表象，發現背後隱藏之理論意涵。

### 一、權力（power）、結構（structure）與無政府狀態（anarchy）

新現實主義（亦稱結構現實主義）緣起於以 Edward Carr 與 Hans Morgenthau 為代表的現實主義（realism），由於「現實主義」無法對國際快速變遷的全球化環境提出完整解釋，學者 Kenneth Waltz 與 Robert Gilpin 等人，便提出一套「國際結構與國際體系」之論述，用以描述、解釋與預測國家行為（Waltz, 1979:38-93; Gilpin, 1981:23-34）。其中又以 Waltz 於 1979 年所著《國際政治理論》（*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一書被喻為新現實主義的創始之作。他在本書中提出體系結構的新概念，亦將國際政治視為一種定義精確的結構體系，進而發展出現實主義的權力論（Dominese, 2010:818）。

Waltz 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對於「理論」有其獨到的見解，他認為「理論是人們創造出來用於說明事實的思考過程」（Waltz, 1979:2）。他認為世界是物質力量構成的，反映在國際政治結構時，係指大國軍事力量在國際政治

結構中的對比排列，且假定國際體系中最基本的行動單位是國家，它們往往在無政府狀態（anarchy）下追求權力，並且將權力視為目的，或將之視為追求其他目標的手段，而在國家行為中，國家大致採理性的行為方式（Griffiths, 2007:13）。爰此，Waltz 主張的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決定著國際體系成員之間的政治關係（Malet, 2008:725）。而結構產生作用的方式有二：第一，是透過對行為體的社會化，並且透過行為體之間相互競爭；第二，結構係指系統構成單位的排列方式、行為體功能的方式以及行為體之間的實力分配（Griffiths, 1992:80）。

此外，Waltz 認為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的，行為體（actor）是單一的和相類似的，因此國際體系結構主要是行為體的數量與其各自實力之分配。而實力為行為體的屬性，行為體之間的實力分配，對於國際體系結構之特徵有其決定性影響，即隨著行為體之間實力分配關係發生變化，國際體系結構亦將隨之改變，而一旦結構產生變化，行為體的互動模式也會相應調整，進而產生不同的互動結果。根據 Waltz 的理論，結構係以系統的排序原則來界定，且被定義為單元間能力的分配與單元能力對比差異的程度，國家則根據權力的大小而佔有不同位置（Waltz, 1979:97）。

## 二、互賴（interdependency）、合作（corporation）與制度（institution）

新自由主義（亦稱新自由制度主義）源於 1940 年代發展的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隨後依循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與多元主義（pluralism）之脈絡，總結出區域整合與世界經貿互賴的概念（張亞中，2007：80）。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最主要是受到 1970 年期間發生二次石油危機，以及布列頓森林貨幣體系（Bretton Woods Monetary System）的瓦解等因素而提倡之觀點，由於它恰好對當時國際經濟政策有重要的影響，因而逐漸建立其國際關係理論之地位。

在此學派中，國際關係學者 Robert Keohane 與 Joseph Nye 於 1977 年出版了《權力與相互依賴—轉變中的世界政治》（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一書，其中提出了「複合互賴」（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觀點（Keohane & Nye, 2001:20-32），強調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以及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Keohane, 1989:4）對於協調國家之間的關係具有重要作用。此外，Keohane 於 1984 年出版的《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一書，更深入地探討了霸權與國際建制之間的關係。本書的核心論點在於已開發工業化的市場經濟國家在美國霸權衰落之後，如何透過國際建制的維持和建設來促進彼此間的合作，以避免紛爭。作者認為霸權國家所主導建立的國際建制會在霸權國家消失後繼續發揮原有的作用，協調各國之間的關係，而在國際建制的協調作用下，國家之間的合作將成為國家之間政治關係的主要議題。

其次，由於新自由主義可謂是對新現實主義的批判與繼承，因此在理論的假定方面仍然接受「無政府狀態」、「國家是理性行為體」以及「民族國家是國際體系的基本單元」等三個新現實主義理論的假定。即便如此，新自由主義所推論的結論卻與新現實主義大相逕庭。新自由主義主張可以透過建立國際建制來克服政治市場失靈，進而減少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的負面影響，因此，無政府狀態下國際體系仍是處於有秩序的狀態下（Keohane, 1984:81）。此外，國際建制是一種持續、相互關聯之正式與非正式的規則體系，這些規則體系可以制約行為體的活動、界定行為規範，使行為體的期望值趨於一致（Keohane, 1988:383）。

再者，新自由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特點除了結構之外，還包括「進程」（process）（Nye, 1988:22-30）。所謂進程係指國際體系中基本單元間的互動方式與類型，影響國際進程的二個因素是「體系結構」和「國際建制」，其中又以國際建制為國際體系中最主要的特徵（Hasenclever, Mayer & Rittberger, 1996:220-221）。在沒有中央權威的國際社會中，國際關係的結構與進程是透過國際制度體現出來的，國際社會的權威不是集中在個別國家手中，而是「愈來愈轉移到國際建制之中」。因此，在新自由主義理論中，影響國家行為最關鍵的變數就是國際建制（regimes），而國際建制也決定了國家行為。

### 三、認同（identity）、角色（role）與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

建構主義（亦稱社會建構主義）興起於 1980 年中後期，由於它針對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等國際關係主流理論提出質疑與批判，至 1990 年開始受到國際政治學界的重視，並逐漸成為推動第三次辯論向縱深方向發展的學派。相較於新現實主義注重權力、新自由主義注重相互依賴等觀點，建構主義主要在探討人類意識及其在國際關係中的角色，以及國家認同和利益的形成（莫大華，2003：70）。在這個屬於「建構主義轉向」（劉永濤，1999：37-40）的時期，又以美國學者 Alexander Wendt 所提出的觀點最具影響力，其中他分別於 1987 年、1992 年與 1999 年所撰的「國際關係理論中的行為主體—結構問題」（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無政府狀態是國家

造就的：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以及《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等3篇重要的論文與著作，分別象徵了建構主義的興起、成型與成熟的三個階段，而《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理論》更成為在探討國際關係建構主義理論之代表性著作。

建構主義是從社會建構的觀點詮釋國際體系的內涵與特徵(張亞中, 2007: 92)，它將國際體系視為社會體系，認為國際體系的轉換與國家行為皆是社會建構而成。因此，建構主義注重在國際關係中的社會規範結構，強調在國家行為與利益的形成過程中，「認同」、「規範」與「文化」等因素對於行為主體(agent)與體系結構間的互構關係具有重要作用。Wendt 認為行為主體的互動構成了共享知識(shared knowledge)的社會結構，而結構又建構了行為主體的身分與利益，如此相互作用周轉，形成國際社會建構的最大特徵(秦亞青, 2001: 231-264)。

其次，在探討認同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關係部分，Wendt 首先將認同界定為行為主體「對自身相當穩定的、特定角色的理解和期望」(Wendt, 1992:397)，而這樣的自我領悟則會決定國家利益。在建構主義中，強調國家環境的文化與制度性因素，這些因素不但會影響國家的行為，更會形塑國家對於自我身分的認同，造成國家特徵的改變以及國家利益與安全的取向。

#### 四、三大主流理論之差異比較

經由上述對國際關係三大主流理論之核心觀點探討後，可作出下列差異比較：

(一) 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二者分別以「權力」與「制度」二個不同的核心論點，對國際體系結構與國家行為進行各自的解釋：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關係的實質是衝突，國家之間行為的互動，目的在於權力的競爭；另新自由主義則是認為國際關係的實質是合作，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能夠透過國際制度而建立秩序，並且為其利益而不斷努力，因而產生所謂的「絕對收益」(absolute gains)概念。在新自由主義中，較著重的是理性原則與規範制度下各國行為體之競合互利關係。

(二) 建構主義的出現，可謂是一種對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批判與反動，以Wendt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它從根本上就推翻了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所主張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的前提假定，他認為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是國家所造成的，並且視國際體系為社會體系，其中包含著多種形式的文

化，即所謂的霍布斯文化（Hobbesian culture）、洛克文化（Lockean culture）與康德文化（Kantian culture）等三種國際體系結構的無政府文化（Wendt, 1999: 257-258），因而打破了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單一性的無政府狀態論點，並且強調在探索國際關係理論知識的研究方法部分，建構主義主張的是多元的研究途徑，亦即包含了政治、社會、經濟、歷史與文化等各方面的作用。

（三）三大主流理論之差異比較如表 1 所示：

表 1 國際關係三大主流理論差異比較表

理論比較	新現實主義	新自由主義	建構主義
分析方法	結構理論、演繹法、微觀經濟學	制度分析、博弈理論、心理學、個案	演繹法、心理學
分析單位	國家（大國）	國家	國家
基本模型	國際政治—權力（國際體系結構）	國家互動—制度	國際政治—意念結構
基本假定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國家是追求效用極大化的單依理性行為者。</li> <li>2. 無政府狀態決定國家展現的理性內涵。</li> <li>3. 國家行為由國際體系結構加以解釋。</li> <li>4. 國家利益是行為的動機。</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強調以集體行動解決問題。</li> <li>2. 國際合作是可能的。</li> <li>3. 非國家行為者在國際體系同樣具有重要功用。</li> <li>4. 國際體系權力是分散與流動的。</li> <li>5. 自由民主國家不易發動戰爭。</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國際體系是社會建構出來的。</li> <li>2. 在建構現實方面，意念扮演重要角色。</li> <li>3. 客觀與獨立於人類理解之外的社會現實與政治現實是不存在的。</li> <li>4. 觀念性與物質因素同等重要。</li> </ol>
主要概念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無政府狀態</li> <li>2. 自助</li> <li>3. 國際結構</li> <li>4. 相對獲益</li> <li>5. 霸權穩定</li> <li>6. 權力平衡</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無政府狀態</li> <li>2. 國際建制</li> <li>3. 絕對獲益</li> <li>4. 相互依存</li> <li>5. 合作</li> </ol>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意念</li> <li>2. 互為主體性</li> <li>3. 社會建構</li> <li>4. 文化</li> <li>5. 身分認同</li> </ol>



<p>主要論點</p>	<p>1.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決定了國家採取自助原則。 2.國際體系的權力分配結構，決定了國家行為。</p>	<p>儘管國際無政府狀態使國家合作存在不確定性，但制度可減輕它，且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並維持國家合作。</p>	<p>1.行為主體的觀念建構了國家對權力與利益的認知，並且形成國家的身份與認同地位。 2.意念結構與體系文化制約了國家對外行為與互動模式，進而影響國際政治結果。</p>
<p>代表人物與著作</p>	<p>1.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9. 2.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981. 3.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1973.</p>	<p>1.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1977. 2.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993.</p>	<p>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99.</p>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 叁、「中共崛起」之理論檢證

有關「中共崛起」的論述，一般可以中共總理溫家寶於 2003 年 12 月訪美時，在哈佛大學發表一篇題為「把目光投向中國」的專題演講時說道：「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改革開放與和平崛起的大國…」（溫家寶，2003）為一分析起點，因為這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國新領導集體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向世界作出的關於中國和平崛起的宣告（朱雲漢、賈慶國，2007：119）。

時至今日，中共崛起已是個不爭的事實，歷經黨內派系的鬥爭，以及鄧小平在獲得黨內認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主張後，將黨的政策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採取改革開放政策，此後，中共的經濟開始快速成長（吳玉山，2007：29-57），並且對國際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在中共實行改革開放的歷程中，本身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共與國際社會的關係也同樣發生巨幅改變，國際間亦出現了許多「中國威脅論」、「中國傲慢論」、「中國強硬論」

、「中國必勝論」等不同的論調（溫家寶，2010），而爭論的焦點就在於中共的國家行為究竟會為世界或是其本身帶來什麼樣的影響與改變。

基於對崛起的中共與國際體系政治變化的理解，本節將從前述國際關係三大主流理論中，再萃取其各自具有代表性的論點，從多元的面向，分別檢視中共崛起的理論與實際，進而找到她在國際關係與國際體系上的定位和應扮演的角色。

## 一、中國威脅論（China threat theory）與權力擴張

所謂「中國威脅論」，意指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將對其他國家的利益和國際秩序提出挑戰，從而對亞太地區和世界的穩定構成威脅（李玉貴，2008：58）。這種觀點主要形成於1990年初的歐美國家，且這些對中共國力發展感到憂心的國家，它們關切的面向包括了軍事、經濟、民族、文明、糧食、環境與人口等種種威脅，而其中又以中共軍力的發展，最受到關注，而此更可以新現實主義加以詮釋。

誠如上一節所述，新現實主義主張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的，雖然權力並不一定是國家行為的目的，但國家為了能夠實現生存與安全之最終目標，必須保持權力的平衡或追求權力的最大化。基於這樣的觀點，當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冷戰兩極體系的贏家後，國際體系便變成了以美國為首的單極體系，甚有觀察家提到「美國強權下之世界和平」（Pax Americana）（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nd U.S. Pacific Command, 2001:67）。對於美國而言，任何可能削弱其對全球領導或影響能力的競爭者，便是潛在的威脅對象。而由目前中共積極在國際間促成中俄同盟以平衡美日安保體制的威脅；透過與德國、法國關係的改善，在經濟上拉攏歐盟，牽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穩住與巴基斯坦的關係，避免刺激印度，以護住運油線、新疆及西藏；善用市場潛力，並透過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體制，結合第三世界國家，抵制美國等現實的國際現勢等（楊志誠，2005：2），均符合新現實主義認為各國總是將權力與安全置於首位，且在面對不確定的國際環境中，國家所要爭取的就是自身權力和利益最大化之合理推論。

其次，若再繼續萃取新現實主義中有關詮釋「中國威脅論」之論點，又可以「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與「權力平衡論」（balance of power theory）作為解釋：

### （一）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Charles Kindleberger 於1971年在《蕭條中的世界》（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中首次提出此論點，其核心概念是認為在國際體系中需要一個主導力量，以管理、規範國際體系成員的互動行為，而通常負有這種責任的國家便被稱為「霸權」，它必須有能力建構國際體系運作的機制法則 (Goldstein, 2005:83)，且具有旺盛的執行意志，能夠推動國際體系成員進行互利行為。若以此相關要件，放諸當前國際體系，當屬美國已被世界各國公認為能夠作為霸權者，而根據美國白宮公布的《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之標題也提到：「為了更加安全、更加繁榮的明天，今天必須領導世界」。

在此定位基礎下，當前美國為了維持國際秩序現狀，就必須阻止挑戰者的出現。當蘇聯解體後，美國在其《防禦計畫指南》(Defence Planning Guidance) 曾提到：「現在我們的戰略必須集中於排除任何未來的全球性競爭者的出現，…，美國必須建立和保衛這樣一種新的秩序，它能遏止那些最有可能成為競爭者的國家無法發揮更大的作用，…，美國必須負有責任地忠告那些錯誤的國家，其行為不僅威脅著我們的利益，也威脅著我們的盟友或朋友的利益，同時還有可能嚴重地擾亂國際關係」。然隨著中共的崛起，讓美國感受到這個競爭者或挑戰者儼然出現，且認為「中國最有可能成為美國全球性對手候選人」(Khalilzad, 1995:30)。與此同時，中共已成功躍升世界第三大經濟體，預計 2020 年時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另中共亦著手強化與位於油輪航道上的國家建立外交及軍事戰略關係，形成「珍珠鏈」(Kynge, 2006:235)，儘管在政治上仍面臨改革，但在 21 世紀的上半葉，中共肯定會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大國 (Kristof, 1993:59-74)。而這就是美國必須防止中共霸權的出現，將中共崛起視為威脅之原因。

## (二) 權力平衡論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誠如 Waltz 所言：「只有生存獲得保證，國家才有可能安全地追求和平、利益與權力等目標」。因此，權力平衡論假定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各國將致力提升其安全能力皆會被視為對其他國家的潛在威脅，並引起相應的反應 (Waltz, 1979:126; Walt, 1987)，而為了防止可能威脅自身安全的霸權，或霸權聯盟之形成，大國將被迫對更強勢的大國採取制衡政策或行為 (Vasquez & Elman, 2002: 23-48; Levy & Thompson, 2005:1-33)。而以此論點觀察中共目前仍積極強化綜合國力與國家發展等實際情況，勢必將引發相關國家的恐懼性反應，且中共權力之提昇，將迫使其他國家因備感威脅而採取自我防衛措施 (Brown, Coté, Lynn-Jones & Miller, 2000:30)。此可由中共於 2009 年舉辦之海上閱兵與建國 60 周年國慶閱兵活動等對於其軍力的展現，以及在釣魚臺、南沙群島捍衛主權的行為等，皆引起西方與周邊國家的不安，甚至視為無法接受

的行為。而過去為遏止蘇聯發展的美日同盟，更在蘇聯解體後，於 1996 年 4 月重新簽署《美日安保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以「穩定該地區安全」（Soeya, 1998:20）而得到驗證。

## 二、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與柔性國力發展

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 1970 年期間國際金融體系與經濟環境的改變因素所影響，而「全球化」（Globalization）無論是國際社會互動所自然形成，抑或是由世界主要的資本主義工業大國所策動，當前吾人所見的經濟全球化可謂是新自由主義實行的結果。基於這樣的思維路徑，又可從上述國際經濟環境之發展背景，延伸出在探討中共崛起這項議題時，必須釐清的幾項問題：第一，何謂「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它與經濟全球化之關聯為何？第二，經濟全球化對中共崛起的影響為何？而「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又是如何興起而形成對美國全球經濟戰略之挑戰？第三，何謂「柔性國力」（Soft Power）？當中共積極參與國際體系活動時，會如何發展「柔性國力」？

首先，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華盛頓共識」是由經濟學家 John Williamson 在 1989 年舉行的國際經濟學會（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會議中首次提出的，當時主要在討論 1980 年中後期以來拉丁美洲的經濟調整和改革方案，而在會後所達成之共識即被稱為「華盛頓共識」。此一概念後於 1990 年落實於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y Foundation）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二大國際金融組織對拉丁美洲國家所實行的經濟改革政策（Williamson, 2004）。在此「共識」下，採取了包括加強財政紀律、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貨膨脹率與穩定宏觀經濟等政策作法（Stiglitz, 1998:7-14），其強調的市場機制功能、鼓吹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場化、放鬆對外資的監管、放鬆政府管制等則屬於新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因而產生「華盛頓共識」採取了「新自由主義」觀點的看法。<sup>2</sup>

「華盛頓共識」在全世界推展實行的結果，使得美國在全球建立了一套國

---

<sup>2</sup> 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際制度包含原則（principles）、規範（norms）、法令（rules）、程序（procedures）或兩國（多國）間公開承認之規範。制度的建立是根據絕對獲利（absolute gains）的互惠概念，互惠概念則包含特定互惠（specific reciprocity）與擴散性互惠（diffuse reciprocity）。前者是指直接的獎勵與懲罰，後者是指他者行為不企求得同樣的反應，而是期望自身行為有助於塑造整個社會的行動。

際經濟市場體系與金融秩序架構。另一方面，當這股以新自由主義為中心的國際經濟自由化思潮席捲全球時，同樣對正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以及「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中共產生了內化的影響，並且顯現在「政府功能最小化」與「經濟體制趨向私有化和自由化」等經濟改革的政策上。不可否認的是，經濟改革是造成中共進步的最主要因素（鄭正鈐、湯麗明，1996：5），自從中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採取諸般改革政策後，其「開放」政策已在與西方國家交往的過程中，獲取了巨大利益（朱鋒、Robert S. Rose，2008：182），而經濟迅速的成長，也令世界各國開始對這個崛起的大國投以更多的目光。在此期間，以美國主導的「華盛頓共識」卻無法通過 90 年代的金融危機考驗，使追隨它的阿根廷、泰國、印尼等國家付出慘痛代價，唯獨中共能夠保持相對穩定，讓學者 Joshua Cooper Ramo 在 2004 年的一場演說中，提出了「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這個新概念。Ramo 指出中共的崛起已經透過引進發展和提供「新物理學」（new physics）概念在改變國際秩序，而西方國家的決策者若僅根據中國將有多少艘航空母艦或平均國內生產總值等舊有規則評估中共實力，將會出現極大的錯誤估計。中國正在成為世界歷史上最大的不對稱超級大國（asymmetric superpower）（Ramo, 2004:2）。

「北京共識」的概念被提出後，立即引起了與「華盛頓共識」之比較論爭。而 Ramo 認為「北京共識」是與「華盛頓共識」西方市場經濟自由放任的原則完全截然不同的發展模式。在國際層次上，「北京共識」講求平等、互惠貿易、不干涉它國內政、以中國傳統文化與哲學為基礎、反霸權主義、強調區域主義與重視文化認同、加強開發中國家之間合作並協助落後國家。在國內經濟發展上「北京共識」則是強調知識與創新。而目前中國成功的經濟模式，已在國際間產生了同化效應，亦即當中共在世界上的經濟利益與交往國家產生同化時，中國的傳統文化也開始逐漸內化為國際社會文化的一部份，「中國化」運動在國際間成為了一種潮流，「孔子學院」（Confucius Institute）已在國際間廣為設立，而又映證了國際關係學者 Joseph Nye 於 1999 年提出「柔性國力」中有關「同化權力」（cooperative power）之主張（Nye, 1990:153-171）；另外在「制度性權力」（institutional power）與「結構性權力」（structure power）方面，亦可由近年來中共積極參與「二十國集團」（Group of Twenty, G20）、「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與「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以及開始承擔國際人道救援與維和任務等國際義務得到驗證（Lampton, 2007:119-120）。而「柔性國力」的顯現，更成為中共在國際社會中之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劉濤，2007：61）。

### 三、身份認同與國家和平崛起

所謂國家的身分認同可定義為：「國家在國際體系的互動中，對自身所屬國家類別的一種認同，且由於這種認同，國家會對不同類型的國家採取不同的戰略思維和行為」。基此，吾人可問：在與世界互動的過程中，中共是如何界定自我的身分？

自 1949 年建政後起算，中共先將自己界定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至 1957 年因為與前蘇聯在對共產主義的認知出現分歧，而將自己界定為「革命的社會主義國家」，到了 1977 年再因為鄧小平開始主導改革開放政策，而逐漸認為自己必須成為國際體系中的一員，而到了現在，在國際間形成區域聯盟以及以非國家行為體亦開始參與和影響國際事務時，中共又將自己界定為東亞共同體之中的一員。這一連串的歷程演變，可見中共在與國際間國家與非國家行為體的互動過程中，已逐步形成了自我的「民族—國家意識」，亦即中共開始以國際體系的角度來界定自己的集體身份，也符合了 Wendt 所言：現在國際體系的重要特徵就是許多前共黨國家與第三世界國家採用了西方國家的制度和觀念，這似乎是有模仿的作用。但這種趨勢卻是以預設集體身份的存在為先決條件的，國家希望成為這種集體身份的一部分（Wendt, 1999:341）。因此，以身分認同的來驗證中共崛起，更可見到中共正透過各種方式，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希望成為國際體系中的一分子。

從建構主義的角度研究中共的國家身分認同，可以發現這種身分將會對國家對外的戰略行為產生影響，雖然它並不一定會彰顯具體的作法，但卻能確立中共的基本行為架構。有關國家的身分認同與其對外的戰略思維關係，可以歸納為：一個國家在正常情況下，會對於自己所認同的國家團體採取雙贏策略，並選擇積極合作戰略；對於非同一團體國家，一般會採取非零和戰略，對於雙邊國際事務會採取部分參與或合作；至於對敵對性較高的外圍團體國家，則經常採取零和戰略，而呈現不合作或衝突模式，如表 2 所示：

表 2 國家身分認同與對外戰略思維關係彙整表

國家身分	同一集團身分	非同一集團身分	敵對集團身分
戰略思維	雙贏	非零和	零和
戰略選擇	積極合作	部分參與、合作	不合作、衝突
合作／衝突機率	高／低	中／中	低／高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按照上述這種思維，對當前中共第四代領導人經常倡言的「和平崛起」、「堅持防禦性國防政策」、「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永不搞擴張」與「永不稱霸」等對外宣示的戰略主軸加以驗證（Huisken, 2009:105-107），可以發現中共領導人對於國家與國際體系之間關係的身分認同是可以靈活調整的，因此當西方國家稱中共是「大國崛起」時，中共能夠從國家內部與國際的身分認同加以評估，而提出中共追求的是「和平崛起」，強調中國的經濟發展要與經濟全球化相聯繫而非相脫離；中國在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的同時，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且這是一條奮力崛起而又堅持和平、堅持不爭霸的道路（鄭必堅，2005：1-8）。且要選擇的是一種支持現狀、多層次、非零合的「和平崛起」戰略（陶儀芬，2004：32）。

## 肆、理論解釋之適用性與侷限性

本文先後探討了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等國際關係三大主流理論之核心論點，以凸顯它們在解釋國際政治現象時所能展現之特性，而在實際驗證時，則是以中共崛起過程中經常被列為重要議題之「中國威脅論」、「北京共識」與「中共國家身分認同」等作為被解釋項，進而檢視這些國際關係理論之解釋力，發現其適用性與侷限性。

所謂理論的適用性，可以一簡單試驗作為說明，即若以新自由主義解釋中共的國家身分認同與國家行為；以建構主義解釋權力擴張影響國際霸權秩序的中國威脅論；以新現實主義解釋中共在經濟全球化下締造的「北京共識」，想必會讓人有張冠李戴之感。如此便得以證明理論之間在解釋力方面確有其各自之適用性與侷限性，而必須在論爭之中，由研究者去思考理論運用之融合與創新。本節將深入探討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在解釋中共崛起時，所形成的理論支撐與互補空間。

### 一、三大主流理論共同關切中共崛起引發之「安全」議題

在國際政治的意義上，可將安全視為一種代表著國家間相互關係之狀態，而這種具有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e）的安全則是一種社會建構。在國際中，一個國家內部的社會規範、認同、法律、習俗等，往往會影響或改變二國安全的行為和利益。行為主體間只有在相互發生關係時，才會發生安全問題，倘若行為主體之間不存在任何互動，則根本無所謂國際關係意義上的安全或不安全。以此觀點來看待中共崛起，當今的中共與國際體系結構中的各個國家行為者

或非國家行為者，就會形成一種安全的互動關係，只是有的國家將它視為威脅，有的將它視為機會（Agarwala, 2002:1-18），而箇中差異就在於以不同的國際關係理論穿透中共崛起這個表象時，呈現出的安全評估結論也就相異。

首先，新現實主義強調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主權國家是國際政治活動的主要行為者，衝突是國家間關係的本質，國家必須透過自助（self-help）來維護自身安全，因此，加強軍事實力與軍事結盟是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手段。與之相較，相互依存安全觀和制度安全觀的基本出發點也是國家安全，依存主要是指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Keohane 認為，制度理論的基本假設之一，就是國家為世界政治的首要角色（Brecher & Harvey, 2002:155），制度安全觀謀求透過國家之間的合作擺脫安全困境，實現國家安全，國家安全是制度安全觀的最終目的。雖然新自由主義者強調國際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對國際關係進程的重要影響，但國際制度一般是國家間談判的結果，其權力也是國家讓予的，國家才是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為體。

其次，建構主義理論亦未跳出國家安全的傳統架構，建構主義者提出的安全共同體指的是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安全共同體，它沒有侵蝕國家的合法性，也未取代國家（袁正清，2001：45）。規範是國家認同和遵守的規範，認同也是國家對自己身分和國際規則的認同，國家是建構主義分析的主要對象，建構主義的創新之處在於著重解釋國家為什麼會採取行動的原因（Finnemore, 1996:142）。

## 二、理論本質對「中共崛起」認識之差異與侷限

在對中共崛起這個政治現象分析的角度上，新現實主義過於強調國際體系結構的物質性，即國際體系的結構是由權力，特別是軍事力量對比決定的。而由這種物質權力決定論的角度往往會得到：一國在國際體系中的相對權力位置與該國奉行的對外政策之間，存在必然的關聯性。亦即當中共開始崛起，實力相對強大，權力急劇膨脹，進而在區域乃至全球的大國實力對比中處於相對有利的位置時，它的國家利益就會體現出打破原有「不合理國際秩序」之行為。然而實際上，中共的崛起是否必然會以武力作為權力擴張之手段，顯然無法如此單純地做出評估，且應納入國際結構中非軍事等多重因素所產生的效益。

其次，新自由主義令其支持者認為「經濟互賴」所構成的經濟全球化可以提供一個穩定的國際體系秩序，使得世界上的強權國家與新興大國皆能在基於成本效益之理性計算下滿足現狀，亦能藉由國際制度，化解國際間的紛爭，並且傾向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將逐漸降低，而經濟利益之利害議題將逐漸加劇（



Baldwin, 1993:301-338)。而在實際的案例中，中共在崛起的過程中，從經濟全球化與相互依賴架構中的弱國逐漸成為強國（丁松泉，2005：219），使吾人看見了「華盛頓共識」之興起，也看見了國際金融危機為新自由主義之主張提供了「北京共識」之反動，二者之論爭延續至 2007 年發生的全球金融風暴迄今仍未休止；此外，2001 年在美國發生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亦顯示出自由民主所遭受的挑戰。上述這些事例皆映證了民主、和平與戰爭的問題在新自由主義的推展下，仍未獲得圓滿的解決，也凸顯了新自由主義過度強調國際經濟活動的制度性安排，忽略了國際關係仍會受到武力衝突、文化因素與意識型態等因素所影響，而中共的崛起則顯示了她在柔性國力發展上，只擷取了新自由主義的部分精華，並且融合了其他因素。

再者，建構主義將國家行為視為社會建構的結果，注重國內的歷史、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作用，因此必須脫離理性計算的解釋模式（Wendt, 1994:384-396）。然而這種論述仍然過於抽象，亦即雖然吾人能夠理解中共對其國家本身的身分認同，將會影響其國家行為，但若從實際的國家行為加以觀察，仍然無法提出其行為必然就是身分認同所產生結果，而仍有可能受到國家利益、權力擴張等因素影響。因此，吾人或許可以推論中共根據現階段的國家身分認同，提出了「和平崛起」立場，但卻無法證明中共的和平崛起只因身分認同的結果所產生。有關建構主義在因果關係之論述上，尚無法成功地整合實證經驗結果，而這是在解讀中共崛起現象時所顯現之問題。

### 三、以國際關係理論檢視中共崛起之新思維

在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過程中，每一次在國際中發生的重大國際事件總會對它產生考驗與挑戰。從歷史的角度加以檢視，自 1980 年起迄今在國際間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前蘇聯與東歐各國進行的經濟改革、德國的統一、華沙公約組織的解散、蘇聯的解體、國際兩極格局的崩潰、中共的崛起等，皆令從事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研究者在理論的運用、解釋與反思時，必須遭遇快速變遷的國際環境而謹慎以對。更有學者認為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及其批評者都沒有預測到自 20 世紀末起發生的這些國際局勢改變（Katzenstein, 1996:3）。

本文欲解釋的對象是「中共崛起」，藉由上述的討論，也同樣能夠發現在國際關係三大主流理論中展現出各自的特色，雖然近期亦有「新一新合成」（Neo-Neo Synthesis）之觀點（Smith, Booth, Zalewski, 1996:163），惟這些理論之間的論戰結果仍屬未定之天。吾人在探討中共崛起等國際政治現象，仍應注重方法論與實際運用的解釋範圍和解釋力較為客觀。

### （一）國際關係理論之方法論評估

檢視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三大理論在體系層次的變數皆可歸納為「結構」(structure)，即它們分別強調以權力、制度與文化作為解釋國際政治現象之自變項，然而事實上當在解釋國家行為時，卻仍然難以避免中介變項的干擾。例如：Waltz 所主張的權力是透過結構影響的，並且又透過競爭與社會化二種方式來影響國家行為；Keohane 的制度是透過影響國家對利益的認知以及不確定性與降低利益成本等進行的。Wendt 的意念是透過國家身分認同，進而影響國家對權力和利益的認知，最後才影響國家行為與互動模式。

上揭現象呈現出一組矛盾問題：第一，科學理論的構建要求達到簡約原則，只有簡潔的理論才能解釋普遍現象與大範圍的事物；第二，以演繹方式構建的理論、以單一變項發展的理論又必然存在解釋力的問題，尤其是它們並不擅長解釋單位層次與單位互動層次上的國家行為。又如：Waltz 的權力結構理論對於國家互動模式就缺乏較佳的解釋力；Wendt 的意念結構理論亦無法有效說明短期的意念變化。由此可知，理論能夠解釋的範圍與解釋力是一組相對的難題。

因此，在研究中共崛起議題時，吾人應該採納 Waltz 所言：任何理論要能正確地限定自己的解釋層次，任何理論都不可能指望面面俱到，萬有引力也不可能去預測一片落葉的軌跡 (Waltz, 1979:121)，惟有站在同一層次，以理論的本質相互補充，才有可能求得周延。

### （二）國際關係理論之應用評估

以國際關係理論檢視中共崛起，就像是在自然科學實驗中，以三稜鏡觀察光線折射的原理一樣，往往呈現出不同的角度與色彩結果。例如：以新現實主義的角度檢視中共崛起，其國力的增強對其他國家而言就是一種威脅，但若以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角度檢視，中共的崛起並不一定會產生威脅，其中有可能會以競爭合作，取代武力衝突，亦有可能以行為者之間的集體身分認同，決定利益所在。其中又可以近期中共在全球金融風暴之適應調整加以證明，僅從權力的角度來認識中共的國家利益是有偏執的。

其次，在國際關係三大主流理論中，「安全」與「利益」皆可謂共同關注之議題，而若觀察當前中共的國家行為可以發現，中共當前是將本身視為一名具有反思能力的行為者，並認為國家是一種制度、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其國家的身分也在國際體系與國內分別被塑造，且相互影響。而這些可以從中共自 1978 年放棄極左的意識型態，改以務實之發展路線，並利用經濟發展增強整體國力 (Bergsten, Gill, Lardy, Mitchell, 2006:120)，以及與國際社會頻繁活躍地互動，例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舉辦 2008 年奧運會、派遣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建立和參與地區性的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等，證明當中共與世界各國的關係愈

來愈緊密時，其國家身分亦同步在改變。

上述這些實際現象，皆與中共崛起密切相關，然欲瞭解其背後隱藏之意涵，無異需以多元的理論檢視互補，方可面面俱到。

## 伍、結論

中共自 1970 年末期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其無論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抑或是國家內部皆已大幅改變，其中可以觀察到的包括綜合國力的提昇，以及在國際社會之規範與制度架構下，不能再以「韜光養晦」之政策方針與世界各國共處，而須以更積極的態度，維護國際秩序、推動國際合作、加強全球治理，以善盡國際社會負責任大國的作用。這些改變均足以說明欲研究中共的崛起，無法單純地以單一理論作為分析途徑，而應能夠充分掌握、認識國際關係理論的特性、功能，方有助於解讀中共崛起對國際關係之變化。

本文以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三種主流理論為途徑，並側重「權力」、「制度」與「文化」三者之間之關聯與影響，而在檢視中共崛起的理論後得到以下發現：

一、新現實主義始終關注中共崛起的安全議題，認為中共國家行為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權力或安全。

二、新自由主義對中共的影響是制度可以幫助國家確定利益與規範國家行為，從而有助於克服國際無政府狀態中的國際秩序，而相互依存能減少國際衝突或引發國際衝突的誘因。

三、建構主義則提出了國際政治體系結構的雙重性（物質與意念），確立了中共的國家行為以文化為內涵的社會實踐在建構國際安全結構中的地位。

此外，在中共崛起的實際方面，吾人必須認識中共未來主導世界秩序的力量並非以超越美國的軍事能力或是挑戰世界霸權，而是在於經濟力量、傳統文化、價值觀等方面的轉化。或如《孫子兵法》所云：「不戰而屈人之兵」，讓世界局勢導向對中國有利的一方。又或如 Ramo 所言：「一個有史以來最少倚賴顯示實力的傳統手段的國家，它正以驚人的力量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國影響，作為顯示實力的主要手段」。而我們應當留意的就是中共發展「柔性國力」之不對稱力量，她正在悄悄地對世界產生巨大影響。

## 參考文獻

丁松泉。(2005)。中國崛起與中美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朱雲漢、賈慶國。(2007)。從國際關係理論看中國崛起。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朱鋒、Robert S. Rose。(2008)。中國崛起：理論與政策的視角。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玉貴。(2008)。解析中國威脅論。理論研究，6，58。

吳玉山。(1996)。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臺北市：正中書局。

吳曉波。(2007)。中國·崛起。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

張亞中。(2007)。國際關係總論。臺北市：揚智文化。

陶儀芬。(2004)。用新腦袋面對中國的「和平崛起」。當代中國研究，2，32。

秦亞青。(2001)。國際政治的社會建構—溫特及其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理論。美歐季刊，15，231-264。

袁正清。(2001)。從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體：建構主義的解析。歐洲研究，4，45。

莫大華。(2003)。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安全研究。臺北市：時英出版社。

溫家寶(2003)。總理哈佛演講：「把目光投向中國」。人民網：<http://www1.peopledaily.com.cn/GB/shehui/1061/2241298.html>。檢索日期：2010.09.28。

溫家寶(2010)。溫家寶：中國永不稱霸。中時電子報：<http://news.chinatimes.com/realtime/0,5255,110109x112010031400533,00.html>。檢索日期：2010.09.28。

楊志誠(2005)。中國發展對台灣的影響及台灣的因應對策。東海大學：<http://www2.thu.edu.tw/~trc/2-thuup/3-program/second/1-class/3-chi/3-02-05.pdf>。檢索日期：2010.19.28。

劉永濤。(1999)。當代西方建構主義取向評析。現代國際關係，9，37-40。

劉濤。(2007)。中國崛起策。北京：新華出版社。

鄭必堅。(2005)。論中國和平崛起發展新道路。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鄭正鈐、湯麗明。(1996)。中國威脅。臺北市：智庫文化。William H. Overholt (1994)：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

Agarwala, Ramgopal. (2002). *The rise of China: threat or opportunity?*. New Delhi: Bookwell.

Baldwin, David A. (1993).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Bergsten, C. Fred; Gill, Bates; Lardy, Nicholas R.; Mitchell, Derek. (2006). *China: the Balance Sheet: What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Now About the Emerging Super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Brecher, Michael & Harvey, Frank P. (2002). *Realism and Institu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Brown, Michael E.; Coté, Owen R.; Lynn-Jones, Sean M.; Miller, Steven E. (2000). *The Rise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MIT.

Dominese, Giorgio. (2010).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n American Science Towards a Pluralism of Thought". *Transition Studies Review*, 16(4), 818.

Finnemore, Martha. (1996).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Griffiths, Martin. (2007).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Goldstein, Joshua S. (2005).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Longman.

Griffiths, Martin. (1992). *Realism, Id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Gurr, Ted Robert. (1970). *Why Men Rebel*.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Hasenclever, Andreas et al. (1996) "Interests, Power, Knowledge: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40(2), 220-221.

Huisken, Ron. (2009). *Rising China: Power and Reassurance*.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Keohane, Robert O. & Nye, Joseph S. (2001).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 London : Longman.

Keohane, Robert O. (1989).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Keohane, Robert O. (1988).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2(4), 383.

Khalilzad, Zalmay. (1995). *From Containment to Global Leadership: America and the World After the Cold War*. CA: RAND.

Kristof, Nicholas D. (1993).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72(5), 59-74.

Kynge, James. (2006). *China Shakes the World : a Titan's Rise and Troubled Future and the Challenge for America*.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Lampton, David M. (2007). "The Faces of Chinese Power". *Foreign Affairs*, 86(1), 119-120.

Levy, Jack S. & Thompson, William R. (2005). "Hegemonic Threats and Great Power Balancing in Europe: 1945-1999". *Security Studies*, 14(1), 1-33.

Malet, David (2008). "Faith in the System: Conceptualizing Grand Strategy in the Post 9/11 World Order".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31(8), 725.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nd U.S. Pacific Command. (2001).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Challenges of China*.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Nye, Joseph S. (1988).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 40(2), 22-30.

Nye, Joseph S. (1990).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80, 153-171.

Ramo, Joshua Cooper. (2004).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Smith, Steve; Booth, Ken; Zalewski, Marysia. (1996).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Soeya, Yoshihide. (1998). *Japan's Dual Identity and the U.S.-Japan Alliance*. C. A.: Stanford University Shorenstein APARC Press.

Stiglitz, Joseph E. (1998). *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Washington D.C.: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Thompson, Kenneth. (1994). *Fathers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the Legacy of Political The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Vasquez, John A. & Elman, Colin. (2002).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Walt, Stephen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Wendt, Alexander. (1994).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2), 384-396.

Wendt, Alexander. (1992).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397.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Williamson, John. (2004).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Paper presented at Foundation CIDOB conference held in Barcelona.

(投稿日期：99年10月7日；採用日期：99年11月2日)

中共崛起的理論與實際：國際關係理論的檢視與分析